涂思宗将军
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曾璧中

一、涂思宗其人

涂思宗是广东省蕉岭县人，1918年毕业于蕉岭县立中学后，即投身孙中山先生所属许崇智援闽粤军第十二统领随营干部训练班，此后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总指挥及军政部桂林办事处主任。1919年至1924年先后参加粤军援闽、讨桂、讨陈（炯明）、讨沈（鸿英）、各战役，并扳平广州商团之乱。1925年以后曾参加第一、二次东征揭阳、棉湖、兴宁、合水……各大战役，北伐时期参加梅县松口、福建永定（讨周荫人）、闽浙、龙潭、徐州、济南……各大战役。1928年11月以中将师长带职入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1931年10月毕业后，参加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后调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营参谋团高级参谋兼第63军副军长。西安事变后1937年3月奉命组织国民党第一个视察团，5月以团长身份率领团员十七人进入中共中央驻地延安。

二、国民党第一个代表团到达陕北和以后的局势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之后，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1月军委会发表顾祝同为西北行营主任负责处理西安事变后东北、西北各军以及红军改编边区改制等问题。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专门就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2月中旬至3月中旬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举行谈判，谈判中心为红军改编和边区政权改制问题。3月下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直接谈判，此次谈判，蒋介石迫于国内舆论和各派抗日势力的压力，原则上接受了共产党在红军和边区问题所提的条件。5月22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到洛阳再次会见蒋介石，相约在庐山继续进行谈判。在这三个多月的谈判：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国民党最初只答应编为三个团，后虽增为六个团，又增为九个团，但人数只限3千人至5千人；苏区政府问题，国民党方面不仅要向边区政府派人，而且要担任主要职务。谈判艰难而曲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94至95页。）但这时日寇全面侵华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年日本关东军侵入通县及平津一带，经常进行“军事演习”，特别6月以后驻扎在军事要区丰台的日军几

乎每天都在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可见停止内战，势在必行。但蒋介石（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何应钦（军政部部长）、顾祝同（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对共产党的情况，知之不多。（见１９７７年《台北市蕉岭同乡会２２周年纪念特刊》４２页杨蔚《涂将军视察延安共区记》。杨现任台湾河南省同乡会理事长，当年是军统局局长戴笠指派以涂思宗的随从参谋名义参加中央视察团的）。为了“对陕北共党军政各机构作全面视察”（见１９８０年《台北市蕉岭同乡会第２６周年纪念特刊》涂思宗《西北行脚》。）因此组织一个以涂思宗为团长的中央视察团到陕北去，其所以派涂思宗去的原因是涂在东征北伐时期，不但是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的嫡系（蒋何曾任第一军军长、涂曾在该军任第三师少将团长、副师长，与顾不但在第一军时是老同事，顾升任第九军军长时，涂又在该军任第三师师长。）尤其重要的是又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关系。（涂思宗的《西北行脚》云：“周叶本在粤军多年同事，叶在粤军中历史亦久，第一次东征时，充粤军第二师张民达师部参谋长，我当时在粤军杨旅当营长，调归张师长直接指挥，任东征前锋，故与叶日夕见面；东征部队到达潮汕东江，叶兼任梅县县长，我亦兼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当时任潮梅行政专员，亦常见面，二位当时皆英气勃勃……”涂思宗就是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被派为中央考察团团长考察陕北的。何况根据跟随涂思宗一同会见毛泽东等人的杨蔚的文章说：“毛泽东、朱德跟涂思宗也是早年就认识的。”根据涂思宗《西北行脚》及杨蔚《涂将军视察延安共区记》等文记载１９３７年的二月末国民党军委会已派涂思宗为团长组织中央考察团，几乎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各方面的人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军委

会、军政部、中央军校、军统局、西北行营、陕西省政府……）才集中西安，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到西安迎接，商谈前往路线及视察方式，“临行前，顾主任（西北行营主任）致开会词并介绍周恩来、叶剑英与全团人员认识，并请彼二人致词。”（见涂思宗《西北行脚》）次日即分乘四辆大汽车出发，经三原、铜川，沿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之线向延安进发，车行四日始抵延安。涂思宗诗云：“风驰电掣赴延安，千里迢迢四日间。”（见1979年台湾华光书局出版涂思宗《梦影尘痕诗稿》8页《丁丑延安之行》。）当时延安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报导如下：“本报特讯：中央考察团由团长涂思宗率领……已于昨日到达云阳镇，备受红军热烈欢迎，不日可到延安。闻考察团此来任务系调查特区军政及民众组织情形，驻延安各界准备极热烈之欢迎，特区政府派要员前往甘泉迎接。中央考察团此来，对于特区救亡运动将有新的指导，使特区与中央的关系将有更进一步的改善云。”（1937年5月26日第三版）同日《新中华报》第一版《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社论说：“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发出后三月，遂有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之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可堪庆贺之事，盖此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后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实可望其有更大踏步之发展。此实不持为中华民族之幸，抑亦为世界反侵略战争之幸……。”五月廿九日中央考察团抵达延安，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以及延安各部队及音乐队在城南举行欢迎。（见1937年5月31日《新中华报·新华号外》）据当时叶剑英对涂思宗说：“自有共党以来，

第一次伟大场面。”（见《西北行脚》）林伯渠一行偕同考察团到新设备之招待所，当晚特区政府设宴为考察团洗尘，宴后举行晚会，据5月31日的《新中华报》号外报导：“会议中首由林主席宣布开会，次由毛主席致欢迎词，大意称：今天这个欢迎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来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中央考察团此来，使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以后毛泽东又说明两点：一、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今天的事实，考察团之到来，就证明双方都有诚意的；二是又有人怀疑两党合作双方都有阴谋诡计，都是临时策略作用，“我想：在西安事变以后，事实更加告诉了大家，是向着团结方面的……。”最后称：“共产党方面诚意的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充分的表现云。”接着涂思宗的说话也“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扫除误会矛盾，以对付我们的敌人。”又6月30日延安城各机关群众团体武装部队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大操场，到会约五六千人，首先马县长宣布开会意义后，继选马县长、延安抗救会主任、林校长、冯文彬、刘长胜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接着就是毛主席报告，大意谓：“……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现在国共两方面均感觉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其次，对于某些人怀疑两党是否诚意合作，亦做了详细解释。毛主席报告后，接着朱总司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主席致欢迎词。（见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1937年5月31日《新华号外》第一版。）中央考察团在陕北期间，除涂思宗以团长身份多次“率随从往毛泽东官邸拜访”外，“先是集体行动视察边区政府各机关”，以后“将党政军分为三组，以组为单位，分途视察较为重要机构、军政学校及军队”。视察告一段落后一段时间，各团员分别活动，作个别私人接触”。据涂思宗《西北行脚》所记，除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频繁接触外，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林彪、陈赓、周士第、秦邦宪、张闻天、廖承志、康克清……。（涂思宗《西北行脚》说：廖以红色记者身份前来晤谈……康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考察团到该校时由该校校长林彪特别介绍见面。）

五月卅一日中央考察团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南京汇报以后，蒋介石才表示给红军三个师番号，自行委任三师师长，人数可为四万五千人；边区由国民党派正职官长（可由共产党提名推荐国民党中央的人）副职由边区自己推荐，可由林伯渠担任。几个月没有结果的谈判推进了一大步，涂思宗率领的中央考察团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越月，七七芦沟桥事变，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相续到庐山、南京，八月廿二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九月十二日又按照抗战的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九月廿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越日，蒋介石就此发表谈话。毛泽东说：“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

立，对于两党联合抗日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三、共产党没有忘记涂思宗

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悬挂着的和去年七月一日向全国发布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好几幅涂思宗为团长的中央考察团的照片是一证，１９８７年涂思宗遗孀徐琼英由台湾回到大陆，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统战部为其发出证明，文曰：

据历史资料记载：涂思宗先生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军政部桂林办事处主任，陆军总部高参及总指挥等职，西安事变后，曾被蒋介石任命为陕北视察团团长到解放区视察并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商议红军改编及国共合作事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解放前夕，涂随蒋氏去台后，因不满蒋氏当局的统治，于１９５０年离台到香港定居。涂在港期间叶剑英同志曾邀请其回大陆观光，后因病于１９８１年在港去世。

可见凡是做了对人民对共产党有益的事的人，不管时间多久，人民和党都不会忘记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件事可以给今天台湾当局一个启发。

吴伟康传略

赖雨桐整理

吴伟康（1882—1947），又名吴觉民，为洪门领袖，通称“汉山大哥”，三圳东岭人，前清秀才。清光绪末，（1908）吴伟康南渡爪哇，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国民革命，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组织寄南社，旋改为华侨书报社。他任社长，广搜书报，供众阅览，以播革命思潮。此时，他加入同盟会，为国民革命积极筹款。1910年，黄兴到吧城筹饷。吴伟康主动配合，奔走南洋各地，不遗余力，筹得巨款，济助1911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

1911年10月，武昌义旗举后，吴伟康回国参加军旅，与张醁村、熊越山等组织光复第四军，设司令部于汕头。他任财政处长。同时回蕉岭成立机关，任同盟会蕉岭分部长。1912年初，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颁给吴伟康旌义状。

民国2年（1913）秋，吴伟康抵台湾，劝说吴颂贤、叶水传等参加罗福星的革命党，并指导秘密结社之法。返回国内后，他曾一度供职滇军，后任从化县长，广东省议

会议员。后来，吴伟康离粤赴法国留学，为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生。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赠以联云："既有勋名惊海内，更携书剑客天涯。"学成回国后，吴伟康以民国告成，首重教育，自动出巨资创办三圳区立高等小学。后由小学加办中学，他亦慷慨倾囊。乡人连选他为首、二届校董会董事长，连任达6年之久。

民国8年（1919），吴伟康再至印尼巴达维亚，与华侨书报社同志一起倡办《天声日报》，被举为副社长。民国10年（1921），他返国，任中国国民党蕉岭县分部长。时广东省各县县长由民选任，被选为蕉岭县县长，至民国12年（1923）卸事。民国13年（1924）国民党改组，广州有课吏馆之设，考入研究。民国14年（1925），奉派为平远县长，至民国17年（1928）卸事。在任期间，禁烟禁赌，严厉执行，市政教育，竭力改革。

民国17年（1928），吴伟康复出印尼，任《天声日报》社长，任国民党驻荷属总支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等职。

民国25年（1936），吴伟康归国，任广东省参议员，蕉岭县参议会议长等职。1939年，吴伟康参与创办仓海职业学校，为该校筹备委员。他旋即到南洋群岛募捐，募得10万元巨款，解决了学校开办经费。他被选为仓海职业学校副校长。

民国36年（1947），吴伟康患病在家，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其生前刻苦节俭储蓄，除留一部分为其家属生活费外，所余悉数捐助办学，资助学校有蕉中、镇南、晋元、仓海等4间中学和牖民小学、徐溪中心小学等。1947年8月9日，吴伟康病殁于家，享年65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曾潜英先生传略

曾璧中

先生讳潜英字特生，广东省蕉岭县人，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其先祖由江西南丰迁福建宁化，因宋元兵扰入粤始祖裕振公又自宁化入镇平（今蕉岭）。（见１９８３年1月台北市、蕉岭同乡会出版之《蕉岭设治三百五十周年纪念特刊》２９页），居今日新铺之至门向东。五世祖上寿公因娶林姓开基祖隐叟公之女，由汕坑蕉头窝迁南山下。奕叶相承，传祖父超腾公，父少帆公，均擅岐黄，悬壶济世，闾里知名。母李太夫人生子女各六人，先生行十一，兄弟中有三兄匪石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为粤军宿将，辛亥革命、东征、北伐、抗日，无役不与。抗战时期，任第十二集团军通讯兵团少将团长。

先生于１９１５年就读本村上寿学校，毕业后考入梅县省立第五中学，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遂投笔从戎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在学期间以学生军参加东征棉湖各大战役，１９２５年一月毕业，任粤军第一师第二团机关枪连少尉排长，同年四月升第一师第三团机关枪连连长。１９

27年春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高级班军事科，次年春毕业，调升为第四军司令部少校参谋，旋任营长。1931年春升上校参谋，1932年夏带职入陆军大学第十期，1935年八月毕业，任陆军第四师少将参谋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任186师548旅少将旅长，奉命防守广东从化一带，时日寇近卫师团进犯，先生以一团固守正面阵地，另一团利用山峦丛林掩蔽，向敌人迂回突袭，予敌重创。1940年秋，日寇又集结三至四师团兵力再向粤北进犯，友军被迫纷纷后撤，先生率部向从化良口增援，与敌人作拉锯战，在敌我伤亡惨重之际，军长询问先生尚能支持多久，先生谓再持续一周，必达战果，其时某师长从伤亡惨重不堪再守为辞，主张后撤，先生慷慨陈词："宁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以本军后退牵累全局。"在先生鼓励下，卒达预期战果，赢得第三次粤北大捷。1941年一月北调三十四集团军总部高级参谋，四月又调为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办公厅主任兼总队长，以年终考核"学术优良"，调充州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率部防守黄河风陵渡与渭函一带渡口，使敌人对此天堑，无计可施。继以"有勇有谋"、"工作努力"、"才学卓越"之考绩，并任第三集团军总部中将参谋长，该集团军总司令为共产党员赵寿山（解放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及陕西省省长……）适赵进入解放区，遗下之妻子家人得先生掩护，免受迫害。其后调任中央训练团西北分团廿四军官总队总队长、豫北师管区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联合后勤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热河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第五十一师师长，六十七军副军长兼285师师长，第十军副军长及海南防卫军第二路副司令兼参谋长。1950年九月在台湾任国

防部高级参谋，１９５３年春调任联勤总部高级参谋兼第三组组长，１９５５年调任军眷管理处处长，１９５６年调任国防部高参以迄退休。

先生事亲孝，其事耄耋之外母，晨昏定省，无间寒暑。月薪所入，除家用外，悉以周济亲朋故旧，身后，家无长物。其为人以廉能有威，察微知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赏罚严明，躬亲率物见称于时。临终顾命："有一薄棺、一石碑，即于愿已足"。晚年患痹，不良于行。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６日至荣民总医院住院检查足疾，２１日上午九时忽以心脏病去世，年七十有二。

夫人邓絜吟女士，惠阳淡水人，广州执信女中毕业后曾在光华医学院习医。慈慧温恭，为先生得力之内助，相夫教子，卓有贤声，先生去世后，移居加拿大之温哥华。子孝修毕业台湾陆军军官学校第卅一期，曾任排连长及副营长等职，退役后，任台湾保险公司襄理；媳李碧翘为医学士，在台湾业医；长女昭瑞，毕业华南农学院，去年在华南师范大学生物系退休，适华南师大物理系副教授曾式梅，式梅为粤军耆宿曾则生先生长公子，次建新，三昭炫均留学加拿大，在加适人；孙女素兰以聪明伶俐为先生生前所宠爱。阶兰挺秀，后起有人，惟先生遗骸不能归葬故土，是不能无憾于九泉！

钟公任传略

赖雨桐整理

钟公任（1882—1947），三圳铁西人，清廪生，曾考入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旋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数理化。留学期间，曾认识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毕业返国后，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前往印尼，曾任义成学校校长，同盟会巴达维亚支部评议部长，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钟公任以归国华侨身份，专程从印尼前往南京祝贺，受到南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后来，他被聘为《华铎报》、《天声日报》总编辑。

民国4年（1915），袁世凯窃取政权，恢复帝制。钟公任当即发表《讨袁记》，给予无情的抨击，赞翊共和。当帝国主义列强妄图趁军阀混战之机侵略中国时，钟公任发表《救国津梁》等文章，谴责帝国主义罪行。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印尼雅加达华侨追悼孙中山大会时，钟公任挽以长联，为人传诵。联文是："军阀专横，官僚专横，政客专横，所有富商巨贾俱专横，当此人欲横侵，非本我公主义，实行建国大纲，安见赤县神州，

不随旧日潮流而去；税关被夺，航路被夺，租界被夺，其余铁道矿山亦被夺，际兹主权夺尽，设照先生遗言，取销列强苛约，岂令欧风美雨，直逼太平海面而来。”此联痛斥军阀、官僚、政客、富商的专横劣行；对帝国主义夺取我国主权，更显出无比愤慨之情。钟公任还为《天声日报》代作挽联，联文是：“富贵何心，荣辱何心，恩怨何心，祇本此救国孤衷，造出广大慈航，愍焉济斯民于水火。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问谁能继公素志，顿使神明华胄，屹然树伟绩于亚东。”此联渴望有谁能继孙中山的遗志，把祖国强盛起来。钟公任之笔墨纵横，文章气魄，可于此两联中窥见一斑。他因撰此联，触荷印政府之忌，与吴公辅、谢作民等8人，于1925年同被驱逐出境。

1926年，钟公任曾任广东省东江行政视察专员。1927年，他被聘为县立蕉岭中学校长。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会员。国民党党中央执委咨行考试院以合格简任官资格登记。1932年，国民党中央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探》，钟公任是编辑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钟公任赞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曾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有过多次的书信来往，共商抗日救国大事。当地父老有二人曾阅过周恩来给钟公任的信函。

1939年，钟公任回到蕉岭，曾担任蕉岭县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9月，任仓海职业学校代校长，代理涂思宗、吴伟康两位校长处理校务。同时兼任蕉岭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孕明学校董事长等职。

钟公任生平著述主要有：《公任文存》两集、《孙中山先生著述生涯》、《救国津梁》、《三民主义理论的研究》、

《讨袁记》等。晚年居家，已拟好《蕉岭乡土地理历史》大纲，并着手编著此书，但志未遂便于1947年在家中病逝。

陈伯英烈士传略

陈　瑜　　陈我益　　整　理

陈伯英，（1898——1925）原名俊生，新铺福岭村人。生于贫苦农民家里，兄弟姐妹九人中，伯英居长。其秉性耿直，少有大志，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因为家计，随父经商，开设小店，艰苦营生。稍长，远走南洋，到马来西亚做工。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民主革命浪潮空前高涨，伯英在海外受革命思想影响，立下救国救民的伟志。1920年春毅然返回祖国，只身前往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其时，结识了叶剑英同志，彼此志趣相投，成为挚友，后结拜为兄弟，改名伯英，而剑英稍长，以兄称呼。1922年云南讲武堂毕业，回到广州。其时正是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在广州蒙难。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官兵和海外华侨纷纷通电声讨叛贼陈炯明。叶剑英在广州发动云南讲武堂同学，一起发出声讨通电。伯英积极响应，并协助剑英做好联络工作。不久，随叶剑英前赴福州参加许崇智部队。

同年10月孙中山决定讨伐陈炯明，电令在闽的许部改编为东路讨贼军。许崇智为总令司，张民达为第八旅旅长，叶剑英为旅参谋长，陈伯英为排长。1923年2月许部返粤讨伐炯明，伯英随军参加战斗。8月，孙中山督师东征，叶英所在部队在惠州、博罗一带，与陈炯明部队交战大小数十役。攻打泰尾之役，叶剑英参谋长特任命陈伯英率尖刀排直插入敌人心脏。伯英忠勇果敢，身先士卒，尖刀排穿插在敌军中，取得辉煌战果。孙中山称赞第八旅是“真正的革命军队”。陈伯英也受到嘉奖。

1924年1月21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有李大钊、毛泽东等9名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3月间，孙中山加强军队建设，授令廖仲凯组织黄埔军校，叶剑英参加筹备工作。陈伯英随叶参谋长出入于军校大门，参与筹办事宜，因而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期间，陈伯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政干部。6月，孙中山将原粤军和东路讨贼军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二师，以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民达为师长，叶剑英为参谋长，陈伯英仍任职军中。这支新建的革命军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在广西、江西、粤北、粤东、福建等地同军阀作战，所向披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授意廖仲凯，决定在建国粤军第二师成立一个独立营，在中山县香洲设营训练，培训工农革命骨干，壮大革命力量。叶剑英负责独立营组建工作，由黄埔军校拨给俄式武器装备。并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军事、政治骨干，担任各级干部。陈伯英任上尉副官，为营长的左右手。在组建过程中，陈伯英积极做政治思想和发动群众工作。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